

文革小逻辑。文革历史展开教程·前三年

者离幡

序言

这是笔者在向十余位文革史大佬提问和阅（恶）读（补）一些文革资料后，决定梳理出来的。可能不少人对于文革中为什么政策不断变化甚至仿佛前后矛盾（如对军队的态度），为什么中央文革派会选择现实中的做法有疑惑，那么或许这个梳理对解决这些疑惑有帮助——这就是笔者发布这篇文章的原因。注意：这篇文章定位更像教科书，因此没有严谨论证，许多地方可能更像一个简化的模型（笔者在行文中也会反复提到次要因素的重要影响）。请读者注意在看地方或个人角度文革史时不要硬套某个模型，而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

知乎发的笔记已经成了单机版，仅自己可见。因为这篇提纲涵盖了笔记所有内容，而且笔记也有些提法有问题，就不补档了。虽然和《小逻辑》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讲的是文革历史的逻辑，笔者将名字起为“文革小逻辑”并把形式改成了《小逻辑》的样子（笑）。§是每一个章节，“附释”是逻辑，【说明】是相关的具体历史。

新版序

这几个月又读了不少资料，感到之前的叙述纰漏甚多，于是赶在高三之前改了这一稿。另外，同样讲这一段历史的歌曲《文革有点甜》已经发布，希望大家喜欢！

导言

§1 首先，我们要知道文革的两个基本的对立派别，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是什么样的人？在 66 年，这是很明确的。反党委的人是造反派，保党委的人是保守派，以至于现在甚至出现了一种工总司-联动的二元叙事。但是这种泾渭分明的状况在进入 67 年后迅速彻底地模糊了，造反派组织出现了十分复杂的联合、分裂、蜕变、重组，没有一个模型通吃全国各地，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直到 1976 年，随着造反派在怀仁堂事变后被迅速隔离、并在之后几次清洗中被判刑，才又出现明确的标准，即有没有被处罚。

回到 67 年，造反派组织按激进度主要分化成三类：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新保守派（前者在略图上是红色，后两者是粉色）。加上许多省军队扶植的保守派，共四类。



然而它们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一个模型是按一些重要特征的符合程度，将不同的组织归类，相对比较可靠，但是也要具体考察其所作所为。

其次，可以对文革的参与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与特点概括，得到下表：

关系	造反派	过渡类型	保守派
学生	造反派红卫兵（成分较不好，初期被围攻，多被打为右派）	温和造反派/新保守派 红卫兵（成分不好，初期被围攻，多被打为右派）	官办红卫兵（成分好）、保皇派红卫兵/老红卫兵（高干子弟为核心，成分极好），这两者可以兼有
工人（广义工人，在工厂工作的低级干部也算）	造反派工人（出于利益或思考不满于旧秩序而起来造反，初期被围攻，多被打为右派，67年2-4月受压最严重）	温和造反派/新保守派 工人（出于利益或思考不满于旧秩序而起来造反，初期被围攻，多被打为右派，67年2-4月未受压或受压不严重）	保守派工人（对旧秩序满意或盲从、被蒙蔽、裹挟、鼓动，67年2-4月被重新组织）
干部	造反派干部（支持继续革命的干部；地方低级干部相比于高级在此的比例更高）	同情与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走资派干部（掌权的官僚为核心）
军队	军队造反派（主要是军校学生）	同情造反派的军队（野战军为主，仍应该归到走资派里面）	走资派领导且首长反对造反派的军队（地方部队为主）。林彪底下的人并没有怎么支造，所以也算在这里

能够看出具有一些特征的人在加入运动进程时会倾向于某一派。这说明了文革被后来的走资派所渲染的疯狂的表现之下，人们的行为整体上还是理性驱动的。

当然，这个表格是一个简单粗糙的概括。造反派造反、保守派保走资派的原因千奇百怪，因此双方也是鱼龙混杂。比如，造反派中也不都是认同、理解继续革命的人（即使是理解也往往不是开始就理解，而是在斗争中才理解），还有一些自由派、许多投机者和大量理由十分个人化的一般群众，保守派群众组织中多数还是被走资派蒙蔽、蛊惑的群众而真正成为走资派代理人的头头是少数。当权派也不是千篇一律，有狡猾的张体学之类的老油条，也有残暴镇压造反派的韦国清、陈再道。总而言之，上面每个群体往往并不像刻板印象那样，而是千人千面的。

附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奉旨造反论”的荒谬之处。造反派们之所以起来造，绝不是因为毛主席一声令下；造反派后来的被打击，也不是毛主席降温的话的结果，毛主席也谈不上抛弃造反派。毛主席在其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合法性”（造反有理），让人们知道造反行动不是反革命，和遥遥推进与支持的作用。个人崇拜绝不是任何一位造反派起来造反的首要原因。只要你看某一位造反派的回忆录，你就能发现造反派在文革中是主动地参与运动，而不是像傀儡一样被要求行动。此外，它同样无法合理解释保守派起来保走资派的原因。“奉旨造反论”的另一个论据是文革中造反派的行动有红线，有不能反的人，但是这只能说明造反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怀疑一切”，仍然要党的领导而不是安那其主义。事实上，真的触犯了这条红线的造反派，难道不是确实偏离了文革的目的而自己独走的吗？而且造反派当时的力量，不紧抱毛主席能赢吗？赢面更小了！最重要的是，“奉旨造反论”把毛主席与群众对立起来，把文革放回封建王朝的逻辑而消解了关键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却故意忽视毛主席作为工农的领袖、革命路线的司令部，本来就是和造反派同属一个革命主体。

那么，实际的毛主席与地方造反派的关系，或者说，文革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1 中央和地方能够直接互相影响。中央的指示和定性对地方的群众组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地方的群众组织的形势信息，通过仍存在的国家机构、群众组织在北京的代表和串联红卫兵到达中央，影响着中央的决策（但可以被走资派阻断和用以传递错误信息，比如两广）。

2 中央和地方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地方的武斗等等影响生产等重要任务也会影响决策；中央对党委、军队等等旧机构的态度和决策，也会间接影响到地方局势。

3 因此，当一个地方的形势变化时，可以通过中央，间接影响到其他地方。一月风暴的上海、二月镇反的西宁、反复旧的山东，都因此达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4 中央对地方仍是中央更强势。如果一个地方的造反派要求与中央文革派相违背，那么地方造反派往往会有悲剧性的后果。

§2 尽管文革前三年最知名的是学生的活动（红卫兵），但是真正有着影响力和决定作用的还是工人和军队。所以，文革前三年如果有一条“主线”的话，应该是工人造反派与党委，保守派军队和保守派（这三者往往结成同盟：保守派先后受党委、保派军队支持，保守派军队与党委关系亲密）的斗争。而其他的斗争只能算支线。

§3 文革发动的准备期从 64 年四清又一次搞成了包办代替开始。此时，毛主席就已经意识到党的内部运动的反修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下定决心要借用党外的群众的力量，打倒党内的以刘邓为首的、已经暴露出来走资派性质的走资派们。从 65 年末开始，中央文革派四面出击，在文艺学术领域，借《海瑞罢官》打倒了吴晗，彭真保他并封锁中央文革派支持的文章，又搞出“二月提纲”把争论限制在学术领域，于是在 4 月进而打倒了彭真；借严慰冰事件，打倒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罢了安装窃听器的杨尚昆，换上了可信的汪东兴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其中后三位和因为张扬引起其他军头不满进而被打倒的罗瑞卿（毛主席也支持了军头们倒罗以借力打力打击引罗瑞卿作为盟友的刘邓集团）合称为彭罗

陆杨。这样，原来“针插不进”的文艺部的走资派被打垮，之后江青才能掌管并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刘邓集团的军事盟友被“剥笋”，之后才能打倒他们，顺便拉拢了林彪一派的军队来为文革提供支持。当然，作为政治老手，刘邓集团也迅速切割，暂时幸免于被针对，并且负责了最开始两个月的文革。

第一回合

时间：1966.5-1967.1

目标：造反派夺权党委走资派

关键：暴露走资派，造反派形成壮大

结果：十分成功

§4 以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时，毛主席花了很多的努力在旧体系中凿开的文艺方面的口子开始发酵，同月高校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标志出现了反响。另一方面，毛主席继续稳住军队，顺着打倒罗瑞卿之势打倒了罗瑞卿的盟友、刘邓的另一盟友贺龙，以尽力拉拢林彪一派的军头，此外也拉拢其他军头，防止军队妨碍文革。由于军队和党委两个体系、刘邓和林彪派系之间本身就有矛盾，因此，最开始几个月，军队几乎没有介入。此外，毛主席还加强了警备，以防止被走资派先一步政变。

附释：文革实际上是要动军队的走资派的（516通知），所有对军队的稳（66）/肯定（支左）/“保护”或叫隔绝（停止揪军内一小撮）都是策略性的。军队中同样进行了文革，详见67年§13。

§5 6月，面对自发跟进批评被点名的走资派的先行者，刘邓集团的走资派派出工作组（队）来控制文革进程（毛主席当时在杭州，最开始就已经反对但是没有阻止），维持旧秩序【工作组手段包括弃卒（小走资派）保帅（党委和大走资派）、矛头指向黑五类和过去整的人（大抓右派）、包办一切来严密控制进程——最开始甚至不承认红卫兵，工作队则是组织批判彭罗陆杨和文艺界黑线，保护工厂党委，打击提意见的工人】，把文革搞成了反右。他们先是6月在学校派工作组，又是7月在工厂派工作队，后是8、9月组织官办红卫兵。从6月工作组进学校到8月工作组撤出这段时期被称为“50天白色恐怖”。

附释：同时，这个时期工人还在酝酿，不满于工作组倒行逆施的学生的反抗正如历史上的其他时候一样成为运动之嚆矢。这是因为学生没有工作的束缚，加之“停课闹革命”，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运动中。在6月，资源多、信息灵通、对身份负有“责任感”、年轻气盛的中学红二代，由于对过去的中学没有足够偏袒自己而对中学当权派不满，首先强烈反对这些被工作组抛出的学校当权派，甚至因而和工作组发生冲突。北航附的红二代不满于旧团组织，首先成立学生组织“红卫兵”并贴出一些表达造反精神的墙报。

§6 面对刘邓集团的白色专政路线，8月中央文革派开始反击：直接反对工作组和党委的倒行逆施（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并强令召回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成立（“红卫兵”就是清华附的“红卫兵”组织被毛主席认可后，所有学生组织都取名“红卫兵”，进而成为学生组织的代称的）并且在8-11月毛主席8次检阅红卫兵，发布“十六条”规定文革的精神和基本原则，推动“大串联”，并且和北京老红卫兵以血统论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直接斗争。在剩下的几个月里，中央文革派将一些直接反对群众运动的地方大员调走或撤换，将对抗十

六条、挑动群众斗群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使各地工人造反派组织成立壮大的决定性一击），并支持造反派红卫兵，打击老红卫兵。

【说明一】 66 年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作为文革斗争的对象，但直到 11 月却先后是文革的各运动的主导者。他们不许黑五类造反；内部等级森明，以父母级别定高低；支持工作组和刘邓集团：这些原因使得中央文革派 9 月之后就反对他们，而支持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红八月的猖狂（如使用法西斯手段对待师生，甚至把学校变成一座集中营；“破四旧”中极端的手段；迫害知识分子），66 年 9-12 月的争夺话语权的顽抗（靠批判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来试图使批判止步于此而不是继续深入到红二代的爹妈身上，例如北京老红卫兵批斗彭罗陆杨集团），甚至他们的服装（铜头皮带、军装）却成为了今天对红卫兵、乃至对文革的刻板印象，令人唏嘘。

【说明二】 大串联有效扭转了反工作组的学生在全国普遍的劣势。尽管大串联开始的时候串联人中老红卫兵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捅破了各地党委维持的秩序，反而帮助了反工作组的力量。省委们为了自保，普遍让相信党委、出身好的工人组织“赤卫队”，这也成为第一批保守派组织。随着后期所有学生都能串联，反工作组、反老红卫兵的思想广泛传播。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经过大串联不仅很大程度扭转了学生占下风地区的局势，使得全国老红卫兵迅速瓦解，残余的组织（如联动）也成为过街老鼠（如联动六冲公安部遭到群众的反对），以致 67 年初在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基本被击溃；还促进了工人造反派的形成与壮大。在 67 年群众组织分化的时候，主要是他们进行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保守派的甄别；他们也是联系地方造反派与中央造反派的纽带之一。

此外，对于派工作组不满的干部也起来反对党委（如山东王效禹），他们后来形成了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造反派。

附释：66 年的学校斗争有一个规律：冲击旧秩序、领导群众运动者中央文革派就支持，就能得到群众支持而壮大；维护旧秩序、压制群众运动者中央文革派就反对，就会被群众抛弃走向灭亡。

§7 造反派工人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主线的开始，前面的学生斗争只能算序章。最开始，由于要工作，所以工人的精力少，且加之对党委经验主义的迷信，以及成立组织被禁止，因而在 7 月工作队派驻后，作为个体的工人提意见被轻易地组织大量工人围攻甚至大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但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十六条之后，被打击的工人开始联合在一起反击，并在串联的红卫攻击省（市）委的影响下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和党委。后来成立组织的禁令解除后，在深入进工厂的造反派红卫兵帮助下，作为少数派的被整工人迅速成立组织，可谓被党委逼上梁山（当然，如导言所说造反派起来造原因很多样很复杂，往往也有很多个人因素与历史因素在里面）。之后，工人造反派迅速壮大，并同样受到党委打压。但是在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下（“资反路线”），党委在 66 年末不敢再直接打压工人造反派（因为打压者都被撤换），普遍要么宣称支持（如武汉）要么摆烂罢工与用钱收买工人（如上海）。同时期的工人保守派、官办红卫兵由于党委的光环褪去甚至畏于支持，也基本失势，被工人造反派压着打。工人造反派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取得优势。

附释：这一时期，一些无产者群体统合为自为阶级、从而真正主动地参与到历史之中。

§8 农村受党委转移大方向影响，黑五类遭到迫害甚至屠杀，破四旧运动十分广泛。

§9 67 年初，“一月风暴”标志着造反派中工人代替了学生，成为了革命的主力。斗争的主要面变成了革命工人与走资派的斗争。在一月，工人造反派在大部分地区的惊人的力量加之中央的支持不仅让党委倒台，甚至让没有倒台的许多地方军头走资派也不得不服软（如韦国清也去了桂林被老多游街）。

【说明一】工人造反派的斗争真正导致了大部分地区党委的倒台。67年1月，在中央文革派的密切关注与指导下，王洪文率领的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并被中央文革派认可。之后，中央文革派号召全国造反派以上海为模板夺权。在1月末，全国城市的工人造反派都打倒了省及以下的党委并成功夺权或筹备夺权。夺权前，就如何对待保守派成员的问题，有些地区造反派开始出现分裂。在夺权中，工人造反派的分裂分化迅速加深，甚至有蜕化为保守派的（高司）。因而出现的派系往往贯穿了之后的整个文革（如武汉钢新两派）。

2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在毛主席建议下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并实施“三结合”。伴随着各省革委会的筹建过程的，是新秩序在斗争中逐渐建立。

【说明二】随着党委的倒台，一些改革也能够开始正式推行下去（鞍钢宪法）。当然，随着夺权后旧秩序的瓦解，暂时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回合

时间：1967.1-革委会成立

目标：造反派实现和平，被“三结合”进入革委会

关键：显露出各部队的态度；造反派有能力捍卫生存

结果：基本成功

§10 以黑材料问题（军队藏着黑材料不交出来）为导火索，随着有造反派开始出现冲击军区，军头越来越反对造反派；在66年末，有些地方的军队由于和党委的亲密关系已经开始介入（如安徽）。军队介入文革已经无法避免，于是中央文革派决定先发制人，要求军队支左，试图靠军队对党的服从来要求他们支持造反派（批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但

是作为伊始的文件，中央八条写得比较模糊，且大部分内容是约束造反派（贸然冲军队是很冒进的）。

紧接着，“二月逆流”代表着老帅为首的军头们与中央文革派彻底的决裂。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月镇反”“三月黑风”——军队在支左中肆意妄为地曲解和无视八条命令（叶剑英甚至扣压中央命令），在大部分省份攫取造反派夺走的权力，实行军管，打压造反派，扶持保守派甚至旧党委（如武汉）。中央文革派没有实现先发制人的目的，但是这是军队阶级本质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央文革派做出反击，在通过地方造反派的上访和造反派红卫兵了解了各省情况后，把许多直接反对的军头和扶持起的党委调走或撤换。赵永夫因二二三事件被处理后，军头从此不敢用军队直接攻击造反派。在4月，中央文革派让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明确限制军队权力，造反派开始恢复力量。之后几个月，中央文革派在全国各地尽力支持造反派和反对保守派（例子还是武汉）。同时也进行了让步换取支持：以三结合代替造反派夺权。

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对待军队的态度上分裂。有些地方对军队进行了反击（揪军内一小撮）。此外，造反派由于派性（如武汉的钢新之争）、观点差异（温和造反派与激进造反派），在许多地方出现了造反派自己人打自己人（如罗广斌之死）。随着矛盾的激化，武斗之风从春季陆续开始，夏季达到鼎盛，从秋季开始陆续减弱，到次年秋天随着革委会成立陆续结束。

【说明】军头也有比较阴险的没有被调走，比如搞表面支持暗中打压/拉一派打一派，这更加重了派性和派别矛盾（如重庆）。同时，军队的介入带来了热兵器，使得武斗迅速升级（如重庆）。

附释一：“定海神针论”“恢复秩序论”是常见的错误理解。实际上，从目的上，中央文革派并不是想要恢复秩序、恢复生产而派出军队的，这样无法解释二月逆流中央文革派与军头老帅们的决裂。从现实上，军队介入长期看并没有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反而激化了武斗。最开始一度秩序恢复，无非是打压造反派、维持旧秩序的结果，是不可能长久的（后来建

立革委会后军管下的新秩序是另一回事了）。更重要的是，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旧秩序的解体与新秩序的建立，那么亲自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为了维持旧秩序而派出军队？军队暂时维持了旧秩序有什么好赞扬的？这么想的人，实际上就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去了，认为最坏的秩序好过最好的无秩序，甚至认为毛主席是站在自己一边并且文革是“引蛇出洞”的（当时保守派正是这么想的）。

附释二：当然中央文革派也知道以敌我力量的对比，造反派在和军队支持的保守派的武斗上难以取胜，因此打不倒剩余这些有权有枪的走资派，只会使造反派迅速走向衰弱甚至灭亡，还会使群众感到厌倦，使文革失去人心。武斗也和文革理论背道而驰，只能作为维持生存或提高生存能力的手段（文攻武卫）。因此，与走资派达成一定的妥协换取造反派的稳定存在被认可，走向以政治斗争代替武斗的新秩序是必须的。故中央文革派的态度始终是降低武斗烈度（从批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到“停止揪军内一小撮”再到督促革委会成立转到下一阶段，尤其是和各地造反派谈话，支持并安排两派谈判达成“大联合”即妥协），维持着低军事化程度，防止武斗死人过多。乃至于，在武斗高潮的 67 年 8 月，中央文革派抛出王关戚^{不过，由于资料的缺乏，为什么中央文革派抛出王关戚仍扑朔迷离。这里所述有大佬认为存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换取军队的支持（在大部分省，王关戚被审查前造反派的行为基本被容忍；军队在 67 年后名义上支造，即同意让造反派和平生存）。

造反派对服软的走资派和溃散的保守派的“批”也犯了不少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如老多游街韦国清时的过火行为是韦国清彻底走向反动并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 67 年 8 月武汉造反派对前百万雄师成员的报复）。中央文革派也发过一些指示反对过火行为，但是由于没有硬性措施，造反派在“批”时怒火往往非常大，所以效果甚微。

作为群众组织而非先锋队的造反派，由于经验不足和充斥着许多仅仅因为个人利益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同路人”，出现派性是必然的；由于其中的群众中真正的自为的工人阶级较少，而仅仅服从于自己的情绪和直接利益者较多（不过在斗争中后者不断转变为前者），造反派本身也比较幼稚（当然，造反派也在走向成熟），应有的鼓动起群众热情的激进行动与

过火行为边界模糊，所以过火普遍存在是必然的。能在斗争中脱颖而出的领袖还来不及大浪淘沙地成为地区造反派的领袖；自在的工人阶级正处于在斗争中转变为自为阶级的进程中；造反派自己也没有经过淘洗。因此，67-68年的大量非必要的、错误的武斗和过火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劣势甚至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

§11 不同省份，军队还在革委会的筹建中掌握了不同程度的话语权，真正能算造反派掌权的省屈指可数（上海，辽宁，河南，云南，山东）。而在武斗比较激烈的地区（如武汉），革委会往往由于造派派性的内斗、造保持续的派仗而难以筹建，最终成为“三凑合”，成为类似于议会的政治斗争场所。

附释一：这些革委会中，往往群众代表最多，军队代表最有权，干部代表很分裂。这是名义上革委会是新政权形式，但实际上军队掌握着枪杆子干预革委会运行的结果。尽管不是理想的公社式机构，中央文革派仍然选择“三结合”的原因是政治斗争相比于武斗对造派更有利（好处：不用直面武装差距，造反派的生存不会受到直接威胁，能保持群众政治参与度；坏处：在大浪淘沙一样的斗争中坚持到这时的军队政治水平往往较高）；此外行政治理、干部改造的需要也不得不达成不同程度的妥协，只靠造反派自发组织革委会从理论上是错误的，从实际上在大部分省是不可能的，会导致被动。

附释二：从夺权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每一步都往往导致武斗。因此，67年全年武斗烈度最大，次数最多。

第二回合的失败者

在 67 年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失败者。

§12 一些县城由于造反派力量相对较小，军队或保守派使用重武器对付造反派和消息闭塞，从 67 年开始出现了针对造反派的屠杀（如西宁）。一些农村由于消息闭塞、走资派控制行政权力，从 66 年开始出现对黑五类的屠杀（如赣南）。但是更多地方，这两种屠杀是同时进行的，这种往往是或失势、或根基不稳的保守派、新保守派，害怕“黑五类”跟着造反派一起造反，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上的正确，于是对造反派的俘虏和黑五类进行屠杀。

【说明】以广西为例。广西的屠杀是文革中最恶劣、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对造反派打击最大的屠杀。从 67 年在一些农村开始，直到 70 年仍有零星，以 68，69 年为最（农村为主，城市为辅），针对黑五类和造反派 422，由韦国清撑腰的联指和韦国清控制的农村贫农组织甚至采用了活取人肝人肉并分食（对黑五类和诬陷的“反共救国团”）、水淹（对南宁的 422）、活埋（农村黑五类）、灭族（农村黑五类）等骇人手段，屠杀有明

确记录者 8 万多人，总计 10 万-20 万人，令人发指。从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除了对走资派罪行的愤怒之外，我们更要知道广西造反派是如何一步步从优势变成劣势直到被绞杀的。

一方面，韦国清作为一个精明狡猾、政治手腕高超的走资派，宣布 422 内有反共救国军，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走资派，严密封锁消息和人员流动，设立军队控制的贫农委员会，谎报武斗情况。在广东掌权的军头黄永胜的配合下，韦国清瞒过了中央和其他省份，甚至争得了中央对他掌权的支持。同时，韦国清作为军头，直接武装打击造反派。另一方面，广西造反派的头头“三人团”一方面强行反韦、手段粗糙强硬，甚至在 67 年 8 月在北京殴打韦国清；另一方面政治水平低下，往圈套里跳致使造反派在 67、68 年犯了很多政治上不利于己的错误（比如韦国清曾在多个城市挑起武斗，结果 422 被动地迎战，反被诬陷挑起武斗），都是被屠杀很惨的内因。于是，422 组织被从薄弱的地方各个击破，联指在每一个打下 422 的城市都进行了屠杀。68 年，韦国清在造反派占领铁路、抢夺援越武器后（这是严重的错误）又上报中央虚假夸张、掐头去尾的信息，促使中央文革派在 68 年通过了 73 布告（正是直接针对广西而发的）。于是，韦国清顺理成章宣布 422 是反革命，很快靠武器优势（南宁）和恫吓造反派放下武器（桂林）彻底绞杀了造反派的反抗，沦为单方面屠杀。在封锁了省界、农村也进行屠杀的情况下，422 几乎被赶尽杀绝。在后来，广西就这样成了全国造反派势力最弱的省份（完全消失，只有革委会中的傀儡）。韦国清则由于在抗美援越中的重要作用扶摇直上（同时这也是他始终没有被撤换且在后来能直接领导广西革委会并控制后来多次运动为自己所用的重要因素），牢牢控制了广西。

§13 军队也在 67 年开始了文革，但是主要形式是开展“四大”和正面宣传而非“斗批改”。军队造反派也试图夺权，但是由于直接针对并批斗了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派系的人，又受到另一些军头支持，卷入军队派系斗争，被林彪压制了。

附释：由于中央文革派此时需要林彪这一派的军队支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所以毛主席默许了林彪的压制，中央文革派也没有给予支持。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除了南北军事压力等国际因素，军队在文革中没有发生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也不是所有军头走资派都倒台，而只有由中央自上而下调走撤换一部分军头，而只要求它“支造”，即认可造反派的存在的国内因素了：文革需要军队一定程度的支持，如果与军队彻底闹掰，控制不住枪杆子，文革面临的危险将大大增加。

第三回合

时间：清队-九大

目标：在革委会权力斗争的第一、二次交锋中胜出

关键：造反派政治水平和势力强于军头

结果：基本失败

§14 在武斗地区，造反派越发不利。大量造反派的内斗和与保守派的武斗使得这些地区造反派势力越发陷入僵局，死伤、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人心思安和造反派转逍遥都使得造反派人数和影响力减弱。在其他地区，革委会在大部分省份的成立，使得中央文革派判断自下而上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新的秩序已经成立，因此开始了自上而下的第二阶段，却被军队实际掌握了权力（清队、反复旧以及九大）。军队的主导使得造反派进一步被削弱。中央文革派在 68 年下半年加大力度制止武斗（7·3 布告之后大规模强行停止武斗），也要求军头做到一碗水端平，以尽可能保持造反派的生存和影响力。到 68 年 9 月，全国省革

委会全部成立。69年，九大召开。这标志着通过中央文革派与军头为代表的走资派在一定程度上妥协的方式（“安定团结”和宣布林彪为接班人），第一阶段完全结束和第二阶段全面开始，文革的主要斗争方式从武斗转为政治斗争。

【说明一】清队本意是要开启文革第二阶段，打击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也有自上而下地打倒走资派的目的。68年5月开始清队是因为此时自下而上打击走资派已经差不多了，革委会已经大量成立，中央文革派认为已经到了从“斗”到“批改”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建立革委会、大批判后应该清队——早在67年毛主席就提出了需要清队）。又由于中央文革派误判已经换过一遍、没有明面反对文革的军队是支持文革的，也因为此时军队占有主导地位，“自上而下”的权力被授予给了军队，导致在军队掌握大量权力的时候在许多地方又被授予了打击造反派的权力。但是地方掌权的军队许多并不是真心支持文革，而是服从于自己的阶级利益，突然背刺造反派，通过派驻自己控制下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剥夺造反派控制革委会权力、罗织罪名清洗、批斗造反派、办学习班、设立专案组并哗供来整造反派，把“清队”搞成“清造”，甚至扶持保守派与走资派进入革委会，以使革委会中自己优势更大，造反派优势更小（造反派主导的地方、造反派政治水平高的地方也有未被打击甚至反推军队的）。军队在政治斗争的第一回合通过出其不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相比于67年2-4月军队让不少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直接濒于解体，清队中造反派收到的打击无疑还是较小的。不揪，中央文革派在发现清队运动偏离初衷后也进行了纠偏（例如叫停内蒙挖肃，调走滕海清）。清队在九大前烈度大，之后和“一打三反”、“两清一查”合流，在“批林批孔”后基本从话语中消失。

【说明二】反复旧的设想在67年的中央文革派控制的报纸中开始出现，在68年下半年开始提，运动于68年11月至69年5月自山东开始，在全国许多省进行。本身“反复旧”的提法是针对钻入革委会的走资派的，因此在进行的省区多赋予了造反派更大的权力，使造反派在革委会中的势力更大。在清队中被整的那些造反派，怒气很大，甚至很大地压倒了派性，因此反复旧在这些地方迅速展开。这些省造反派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试

图把之前清队时被军队收走的权夺回来，把被抓的造反派放出来。自然而然地，这些地方的造反派与军队出现了大量冲突，甚至有了派仗的苗头，也就违背了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使得中央文革派没有出面支持（也有中央文革派忙于九大召开无暇顾及的因素）。但山东（此外还有黑龙江也类似）却不太一样。由于山东的造反派头头王效禹和本地保守派、中央走资派与军头（尤其是南京的许世友）关系都很差，而且在 68 年恶化，无力控制山东；而且山东的反复旧打击面过大（打击三结合的干部过大）、有派性作祟，中央文革派已经保不住他了，于是他在九大后被作为“安定团结”的靶子打倒，反复旧运动也随之被批判并归于沉寂。而反复旧揭开的问题——军队的排挤与打压，也只得到一定的缓解而并没有解决。这一次，中央文革派明知是造反派的反击却仍然打击，虽然是作为向军队的妥协，但是仍然可以说是失策的——这些失败的造反派之后几乎成为了军队砧板上的鱼肉。造反派在政治斗争中又败。

后记

由于笔者水平不高，有些文字差强人意在所难免，望海涵。在此感谢在撰写过程中所有提供帮助的人，这篇笔者有生以来创作过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没有你们是写不出来的。希望这篇梳理对您能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0000355> 支持！

参考资料

其实就是我在恶补的资料（很惭愧，除了《历程》竟无读完的）

“通史”：

《共和国的历程》北大马会 左翼

《天地反覆》杨继绳 新保 自由

地方史：

《革命造反年代》李逊 自由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本书编写组 老造 左翼及老左

《超凡领袖的挫败》王绍光 新左

《桂林老多四十四年祭》 《广西文革血与火》张雄飞 老造 老左

回忆录：

《十年非梦》黄金海 老造 左翼

《生逢其时》顾建棠 老造 左翼

《青春无痕》陈益南 老造 自由

研究论文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启之 自由